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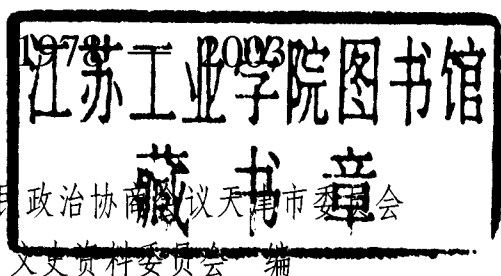
縱橫話文史 揮筆寫春秋

——天津文史資料百輯回眸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委員會 編

天津人民出版社

纵横话文史
挥笔写春秋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2003年第4期, 总第100辑, 纵横
话文史, 挥笔写春秋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
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12

ISBN 7-201-04716-7

I. 天... II. 中... III. 文史资料—天津市
IV. K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121383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宏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875印张

字数: 140千字 印数: 1-3000

定价: 7.00元

功在当代 惠及后世

(代序)

石 坚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以下简称《选辑》)出版 100 期,这是文史界一件大喜事。作为半个天津人和《选辑》的忠实读者,谨向编者、作者表示衷心的祝贺!

翻开《选辑》的目录,真是天津近代史的一部百科全书,多么丰富的历史资料啊!天津近现代的历史,好像重新展现在眼前。政治军事史料中,不仅详细记载了晚清的史料,也有极为丰富的革命史料。从五四运动、建立中共组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各个时期;从李大钊、周恩来、刘少奇、邓颖超、彭真,到于方舟、陈潭秋、张太雷、毛泽民、吉鸿昌、柳直荀、江浩等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活动,都有详实记载。《选辑》中记载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三

次来天津的情况,更是十分珍贵的史料。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来津视察,对天津市的工作提出许多极其重要的指示,《选辑》都作了充分介绍。

天津市在北洋政府时期,曾是众多风云人物发迹或归隐之处。北洋政府的大总统、临时执政和国务总理等,诸如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段祺瑞等等,都和天津密切相关。《选辑》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由于这些史料的作者是亲身经历者,从而更增强了它的说服力。《选辑》中对过去一些名将,诸如张自忠、宋哲元、鹿钟麟、徐树铮、张作霖、孙连仲、于学忠等等的历史功过,都作了客观叙述。

天津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桥

头堡。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等侵华战争,天津是首当其冲。英雄的天津人民为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选辑》中有些文章作了记述。

天津历史上曾有9个外国租界。帝国主义不仅在政治上维护他们殖民者的特权,而且在经济上对我国进行疯狂掠夺,通过银行、洋行、买办等等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选辑》的文章对帝国主义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控诉。这些史料,让天津人民了解过去屈辱的历史,更加热爱伟大的祖国,警惕那些觊觎中国,成天叫嚣“中国威胁”论的帝国主义分子亡我之心不死,警示我们要永远居安思危。

天津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对我国工商业的发展,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选辑》中天津的金融、工业、商

业、盐务、税务、海关、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城市建设、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医药卫生、宗教、社会生活等等方面的内容,应有尽有。

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选辑》,严格遵守周总理对政协文史资料的要求,以“三亲”的文史资料特色,为天津人民特别是青年了解天津的过去,珍视天津来之不易的今天,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提供了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的珍贵教材,实在是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的大好事。值此百期纪念之际,我殷切期望,在过去已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础上,《选辑》办得好上加好!

(作者:天津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天津市人大常委原副主任)

目 录

功在当代 惠及后世(代序)	石 坚(1)
---------------------	----------

春华秋实

我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	袁东衣(1)
天津文史资料工作纪实	乔维熊、谢天培(8)
恢复文史资料工作初期概况(1974—1977)	
.....	徐景星(23)
奋进不止的文史资料工作	南炳文(33)
寻求是一种感受	罗澍伟(41)

追忆故人

对故人的深切怀念	杨大辛(47)
忆炎智同志	赵书军(60)
他们的风范令我难忘	师静淑(64)
听乔老谈文史资料工作	张玉芳(74)
忆在文史办工作的老先生们	周桂兰(77)
我的父亲祝淳夫先生	祝肇奎(81)

文史情缘

- 采访“旧闻”三十年 柴寿安(86)
- 廿余年甘苦话文史 方兆麟(103)
- 追忆 郭璞(136)
- 有个好思路更上一层楼 田桂林(144)
- 从“临时工”到文史专员 吴同宾(149)
- 我·纪念刊·文史资料 林放(153)
- 我的文史情结 李树人(165)
- 我征集港台及海外史料的经历 陈健(170)
- 依依政协情 绵绵文史缘 张绍祖(180)
- 感君为我开耳目 甄光俊(188)

服务社会

- 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 仇志刚(192)
- 特色鲜明的“文史书店” 张仲(201)
- 天津有个文史书刊服务部 罗文华(203)
- 文史书刊服务部,我的良师益友 高士柱(206)
- 文史资料出版印刷的昨天与今天 康明(209)

◆ 袁东衣

我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

我是在 60 年代初开始做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的。1958 年我在天津外贸进出口公司工作,当时统战部让我到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去参加理论学习,为期一年半。在北京我见到不少老朋友和旧同事,他们有的是抗战以前认识的,有的是抗战时期在大后方重庆在一起工作的。东北地区解放较早,我在那里从事外贸工作时也遇到一些老友。这次在北京学习期间又异地重逢,显得特别兴奋和亲热。

在京学习期间,适逢全国政协第三届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周恩来总理在 1959 年一次招待 60 岁以上政协委员的茶

话会上,号召大家将几十年来看到和亲身经历的变化、平生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和见闻掌故等,写成文字,传之后世。当时在场的有北洋政府时期的老人,有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老人,有北伐时期的军政人员,有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起义人员,有建国前的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也有金融、实业、工商、教育、文艺等各界的老年人士。周总理的号召深深地鼓舞了老年委员,他们积极研究如何贯彻和进行这项极有深远意义的宏伟工作。政协全国常委会决定设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来负责规划、组织和推动征集和撰写工作。

我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期间经常抽暇到全国政协去会见老朋友,因而了解到上述情况。同时看到申伯纯(他曾跟随周总理,从事秘书工作多年)和阎宝航等老同志谈起周总理的指示之后的兴奋情景。他们根据周总理的号召进行讨论和研究如何开展工作,竟通宵达旦。大家认为,从清末到1949年全国解放,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化,在这六七十年历史过程中许多历史事件的错综复杂演变过程,历史人物的事迹,各行各业的具体变化等等,现有的文献资料都还远远不够完备。需要群策群力,广泛地发动过去在旧社会具有丰富阅历的老人,特别是那些曾经亲身参与过各次历史事件的人,及时把他们的经历和见闻,如实记叙下来,就很有意义和价值。这样就可以为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者提供有力的事实根据,就可以大大丰富和充实我国的近代历史。

我听到他们的见解,深有同感,同时也对文史工作产生

了极大兴趣。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立后,由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担任主任委员。刘大年、申伯纯等5人担任副主任委员。委员40人。我所熟悉的阎宝航、刘大年、米哲沅、邢赞亨、齐燕铭等人都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这就是我和文史工作发生关系的开始。

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班第二期结业之后,我返回天津,仍在外贸部门工作。我是天津市政协委员,经常参加市政协一些活动。1960年天津市政协也开始筹备文史工作,由副秘书长李敬仁主持,他知道我爱好文史,并且在北京还有几位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朋友。因此征求我的同意,商请统战部出头,从外贸部门借调我到市政协来搞文史工作。我愉快地接受了这项极有意义的任务。当时办公地点设在解放南路273号(现市政协俱乐部楼下),配备了一名专职干部。开始工作时人手缺少,我征得上级同意请来吴同宾先生协助我作秘书工作,但并无任何名义,他是多年

的“老天津”，知识丰富、文笔流畅。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我们两人共同出去采访，由他执笔，写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当时我经常往返京津，征求全国政协文史办的意见，尽量按他们的要求征集与撰写史料。全国政协对天津的史料很重视，要求质量也高。因为天津在我国近代史上占很重要位置，如“天津条约”、“八国联军”、“洋务运动”、“小站练兵”、“壬子兵变”、“天津教案”、“义和团”、“抵制日货”、“劫持溥仪”、“天津便衣队暴动”等大事都发生在天津，天津有过九国租界地，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典型的城市，租界里住着许多清末贵族、下野军阀、失意政客、工商巨头、社会名流等，可以说天津是一个文史资料的宝库。全国政协给天津出了几个题目，要求写在天津居住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传记和轶事，特别是北洋政府时代的人物，年纪已老，他们的史料应尽先抢救。有关各国租界的情况、洋行买办的典型

人物，均是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征集、撰写工作的重点。

当时是解放初期，曾当过官僚政客的老人，要他们谈自己的历史，写自己的经历，确实顾虑重重，说说倒还勉强，但要一五一十地写下来，黑字落到白纸上，恐怕授人以柄，一旦有什么运动，岂不是作茧自缚。所以我们在采访工作中首先要反复地做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只有搞通了思想，他才会真诚地和你合作，才能写出有价值的资料。那时要完成一篇有价值的文稿，需要付出很多时间与精力。初期工作有我和吴同宾还有南开大学的唐克明，面对如此浩瀚的任务，实感力不从心。于是征得上级同意，聘请来两位“写手”协助开展工作。首先我们找到纪华，他的文笔很好，写作也快，在旧社会担任过天津商会会长，经历丰富，对天津各方面情况较为熟悉。他很高兴做这个工作，经他手写了大量的文史资料。随后又找来李鹏图和胡君素，李鹏图的阅历很丰富，当过天津

市财政局长。胡君素担任过报界的编辑,他俩对天津情况都相当了解,素有文才,写文史稿可以说是游刃有余。我们的“写手”逐渐增加,工作量自然也随之加大,大家分别出去进行重点采访,尽量要求当事人自己动笔,写成初稿交我们加以整理。不能写或不愿写的,就动员他口述,由我们作记录,回来整理。

这期间整理出一些名人传记,如孙传芳手下的省长杨文恺,张宗昌的部下林宪祖等。但写全国政协指定的曾毓隽、鹿钟麟的资料就不那么容易了。曾毓隽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交通总长,1961年时已96岁高龄,不愿谈以往的旧事。我和黄逖非二人登门拜访多次。会见时多由他女婿黄大馥(医生)陪同。曾毓隽性情孤僻、高傲,本来他在京多年,会普通话,可是他偏偏只用他的福建话和我们交谈,我们听不懂,只好请他女婿作翻译,讲一句,译一句,非常困难。分明是不欢迎我们。可是我们既下定决

心,就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访问他,还投其所好地请他到福建饭馆里吃了家乡菜,和他谈古说今,向他请教。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我们打开了他的话匣子。请黄大馥执笔,由他口述,写了几篇有关他的历史资料。送到北京,分别刊登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和第41辑上。曾老于1963年去世,由于“抢救”及时,使有关他的史料没有被泯没。全国政协文史委对曾老的史料评价很高。从他所述的史料里我才知道原来“安福系”并非一个具体的组织,而是以段祺瑞为中心的几个政客,大家政见相同,经常相聚在北京安福胡同一所宅院里,在一块吃饭打牌,谈论时局,在风云变幻中共进退,息息相关,一致以拥段为目的,互相提携,一荣皆荣。在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时,他们这一帮“友好”(即安福系)皆攫取了高官厚位。他们最终目的是企图把段祺瑞捧上总统的宝座,大家都加官晋爵。可惜好梦难圆,终于在军

阀派系斗争中败下阵来。“安福系”其实和“政学系”一样，都没有招牌，没有具体的组织，没有形成文字的纲领，只不过是些政见一致的政客组合罢了。

鹿钟麟是西北军名将，他是驱逐溥仪出宫的执行人，曾任国民党政府的兵役部长，为人正直，思想开朗。解放后被任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久居天津，热心街道工作，受到毛主席的称赞。他是个忙人，对于写回忆录则无兴趣，一再推脱不肯执笔。由于谢天培先生和鹿钟麟较熟识，也了解他一些往事，所以就由谢天培负责，做这项工作。谢经常来往于鹿府，多次与鹿长谈，前后两年多的时间，终于写出了近30万字的文稿，送往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

后来我们联系的人多了，同一个命题能有好几个人都知道一些情况。于是改变了工作方式，不再逐位访问，而是把知情人士都请到一起，开几次专题座谈会，大家围绕一个专题，

各抒己见，根据自己的见闻、经历，从不同的角度，互相印证，取长补短，共同凑成一篇完整的资料，由一个人汇总交卷。这样做，既节省了时间，所写成的资料更翔实可靠。譬如有关租界和买办情况的史料，大都是这样搞的。

在天津九国租界里，美国租界位于现大沽路以西，彰德道与开封道之间，到海河边为止。因为存在时间不长，就由美国私自移交给英国管理，日子长了，也就成了英租界的一部分。这事鲜为人知，是我们在整理租界史料中挖掘出来的。九国租界，占地大小不同，存在时间长短相异。有些租界收回时间较早，所存有关档案资料佚失。整理起来十分困难。我们依靠发动知情者座谈，顺藤摸瓜，加以汇总。前后费时数年，动员若干人提供线索，若干写手执笔，一再易稿修改，终于完成了有关天津各国租界情况的历史资料。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1986年出版的《天津租界》一书，其

内容均是采用我们那时所写的文稿。在写作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曾任英租界巡捕总督察的李汉元先生,我们虽是相识不久,但他给我的帮助很大。再有高渤海对法租界的情况了解得很详细,他都提供了相当详细的资料。再有曾任国民党天津市长的杜建时先生,他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我在京认识他后,请他写了一些有关他在天津当市长时的经历,很有史料价值。

洋行买办纯粹是半殖民地的产物,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工具。在中国,以上海和天津的买办为最多。他们利用其特殊地位,从中取利,形成了一个特殊阶级,有时能左右市场的金融,甚至能操纵政局的某些变化。比较大的买办都是些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们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影响,过去文献很少记述。全国政协希望天津能拿出有关这方面较系统的资料来。我找到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的毕鸣岐,他欣然答应,那时他正忙于市工商联的工

作。由于我同他私交甚厚,要求他无论如何也要尽快完成,而且要求高质量。他无暇执笔,我们研究决定由他口述,请纪华作详细记录。前后谈了三个星期,把他所知的有关洋行买办的情况,以及他个人在这方面的经历,详细记录下来,经过整理送往北京。全国政协文史委看到毕鸣岐这篇文章后,认为此稿质量上乘,加倍付给稿费。后来我们又请一些知情人士写了关于中法银行、汇丰银行的买办资料,着重描绘了买办在银行界所起的作用,为研究买办的学者们提供了可贵的参考资料。

关于冀察政务委员会时期宋哲元的29军在天津与日本人针锋相对,以及天津失陷的经过,萧振瀛当天津市长的一些情况,都找人写了文史资料。

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立之初,在杨亦周主任的领导下,文史资料的撰写和征稿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杨亦周是我的老师,我从他那里受到很多教益,他爱好文史,

我们兴趣相同,经常在一起研究如何开展工作。曾计划利用征集来的资料,分门别类,采编成集,自己出书,与各兄弟省市交换文史资料等。正当我们兢兢业业地工作,天津文史工作蒸蒸日上之际,“文革”开始了,文史工作受到冲击。杨亦周主任和我都被关进了牛棚,文史工作陷于停顿,而且一停就是八年。

1974年根据上级的指示,要求恢复文史资料研究和征集工作,开始时是我和吴同宾、乔维熊、谢天培、韩天耀、徐继仁等人凑在一起,工作地点暂在九龙路现九三学社的原址。名为恢复,但实际征集工作无法开展,因为人人心有余悸,谨言慎行。唯恐上纲上线,哪里还敢轻易动笔写文章?这个阶段,只能将工作重点放到整理

过去征集到手而未刊出的旧稿上。经过十年浩劫,幸而过去辛辛苦苦搜集来的文史资料没有散失,得以保存下来。

实际正式恢复文史工作是在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以后,1978年重新组成了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并决定出版不定期的内部刊物,即《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在1978年12月出版问世。此后,平均每年出版4辑、专集二三册。

后来我主持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的工作去了。虽然我不再具体主持文史资料工作,但我还是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委员,我仍然关心着天津市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

(作者:曾任数届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天津文史资料工作纪实

乔雍熊 谢天培 ◇

全国的文史资料工作是 1959 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下开展起来的。当时他号召阅历丰富的老年人士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记录下来,传之后代。当年 7 月,全国政协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并设立了办公室,安排了专职人员。工作开展后,大家热情很高,群策群力,各项工作进展迅速,于 1960 年 1 月将征集到的文稿进行整理,编辑出版了《文史资料选辑》。虽说当时该刊是不定期出版,但因征集来的史料较多,而且经费有保证,在初期每月都出版一辑,每辑均有 10 万字以上。仅 1960 年一年间出版了 12 辑,约 130 万字。有很多历史人物如爱新觉罗·溥仪和溥杰、杜聿明、杜建时、文强、沈醉、王耀武、宋希濂等人都被全国政协聘任为文史专员。他们现身说法,写出自己亲身经历,同时也反映了他们所处的年代的历史状况,史料价值很高。与此同时,各省市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也先后逐步展开。

天津市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迄今已 40 年,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时期(1959—1965);恢复发展时期(1974—1988);开拓新领域时期(1988—1998)。

一、初创时期(1959—1965)

1959 年为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开始起步。当时借鉴全国政协的工作经验,根据天津的具体情况,先在政协委员中征集文史资料。当时尚未成立正式专业机构,由秘

书处负责抓此项工作。征集到一些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后，转送北京全国政协。初期的征集工作重点多着眼于解放前旧军政方面的史料。

经过一年多的摸索与探求，积累了一些经验，根据工作需要，于1960年11月，河北省政协与天津市政协联合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组（其时，天津市为省辖市），组长齐璧亭，副组长3人：李子寿、李敬仁、张羽时。到1961年秋，在市政协第二届委员会期间，成立了河北省暨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共有委员21人。主任杨亦周（河北省副省长、天津市副市长、省市民革主委）。副主任6人：姜战春（省政协副主席）、胡毅（市政协副主席）、廖安邦（省政协副秘书长）、黄逖非（市政协副秘书长）、朱继圣（市民建主委）、王光英（市工商联主委）。同时又成立了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即“文史办公室”。委员会每年召开一至二次会议，听取工作报告，研究确定工作计划。平时根据各委员专长，分别参加征集、审稿以及其他咨询工作。首任文史办主任凌勉之，副主任袁东衣，另有专职干部2人：孟广琨、游德昌，并聘请了谢天培、吴同宾前来协助整理史料。文史办办公地点设在解放南路273号（现市政协俱乐部）。委员会办公室成立后，很快打开了天津市工作的局面，工作开展颇为顺利。当时联系了不少可以提供史料的人士，如张绍曾、陈文会、谢宗陶等，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但这些都联系的人士的情况也不同，有的脑子里确实存有大量资料，但要求本人写成文章有困难。只有很少数人能写出合乎要求的文稿，多数人只能口述而不愿写稿。当时写稿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思想顾虑不少，由军政和工商界人士谈起自己经历来多是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特别涉及到港台及海外关系的人和事，就语焉不详，难以形成完整的史料。这就需要讲政策，摆道理，谈征稿的重要性，多做思想工作，而更重要的是要有人按照要求代替这些人写出合格的文稿。为了工作需要，急需一批能说会写而又有相当阅历的

“写手”来做具体征集工作。经过上级批准,由各有关方面推荐,陆续请来纪华、李鹏图、胡君素、俞志厚、李云汉、李树芬等 10 人来担任此项工作,每月酌给车马费。这些老年同志知识渊博,阅历丰富,联系面广,他们按照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采访组稿、记录、查对、核实、润色整理,坚持“三亲”和“存真求实”的原则。一直到“文革”前,撰写整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根据征集重点,在文史委员中成立了 5 个业务小组:1. 北洋组;2. 政治军事组;3. 文化经济组;4. 宗教组;5. 民族组。组内都是各该界的知名人士,根据自己的特点,回忆往事,兢兢业业地在文史工作这片土地上辛勤地耕耘。光阴流逝,如今已过去近 40 年,已有一些老人仙逝作古,而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珍贵的文史资料。

1963 年 12 月,市政协换届为第三届委员会,河北省暨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扩大到 32 人。主任杨亦周,副主任 10 人:齐璧亭、朱继圣、廖安邦、李子寿、李敬仁、周叔弢、李杰、王光英、凌勉之、胡毅。文史委中的业务组也有所更改,各组的组长为:经济史料组朱继圣;租界史料和社会史料组袁东衣;政治史料组和审稿组黄逖非。文史办公室主任袁东衣,专职干部 2 人:刘振宇、梁国棣。此时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聘请的“写手”逐渐增加,最多时曾有 20 人。“文革”前市政协没有单独的文史经费,征集来的稿件全部转送全国政协,稿酬也由全国政协付给。当时全国政协要求天津市政协文史办公室将居住在天津的解放前各个历史时期的军政人员所了解、所经历的过去的政治内幕,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动他们撰写成史料。为此文史办公室想方设法疏通渠道,尽可能地与这些人士接触,动员他们写史料。

天津文史资料初期的征集工作是根据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精神,以征集北洋时期以来的军政史料为重点,兼顾其他。后来通过实践,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征集面。因为天津是华北重镇,京畿门户,历史悠久。天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典型城市,有过